

# 朱熹對「夷」的看法 及其價值觀的普世意義

主持人：車行健 教授

與談人：劉祥光 教授

## 主持人車行健教授：

作為主持人，首先先介紹主講者和與談人。主講者是田浩教授，詳細的背景資料前兩場的主持人都介紹過了。與談人是歷史系劉祥光教授，我想政大的老師或同學對劉老師也不陌生。劉祥光教授現在是歷史系的系主任。當初安排王夢鷗學術講座的時候，與談人的設立是不必然要有的，有的講座有設置與談人，有些則沒有。我想我們設立學術講座的目的之一是為了讓更多的老師和學者參與，所以還是安排與談人。前兩場安排中研院文哲所的林慶彰教授和臺大中文系的夏長樸教授，都是非常知名的學者。今天第三場邀請歷史系學者，主要原因是田浩教授以學科專長分類來說，在臺灣無疑是歸屬於歷史系的，因為他研究的領域是思想史。田浩教授跟隨余英時先生研究中國思想史，包含朱熹的研究、呂祖謙思想研究，這些部份跟中文系能有更多對話，尤其是在朱子的研究上。這幾年田浩教授的研究在臺灣和中國大陸受到廣泛的認同、迴響。身

為一個歷史學者，田浩教授本身也是宋史專家，在宋史領域中耕耘許久。既然歷史學也是田浩教授的專長，我們也希望擴大參與，可以有更多交流機會，所以請本校歷史系老師一起參與。劉主任是宋史的專家，研究宋代社會文化教育史方面非常知名，今天有這個機會讓兩位教授有直接的學術對應是很有意義的，這是我個人在策畫王夢鷗學術講座時的想法，讓田浩教授不僅跟中文系的學者有交流，也可以跟歷史系的學者交流。

但我想受益最多的還是來參與的學者專家，當然不只是中文系、歷史系或哲學系，還有政治系的學者也來參與講座，像政治系的張其賢老師這三場講座都全程參與。他本身研究中國政治思想史，正好跟田浩教授所講的議題有很多關聯。這個活動可以有這樣的機緣把不同領域、不同學門，不同地方的學者集結起來，例如有來自臺北教育大學的張曉生教授、臺大中文系的史甄陶教授也來參與我們的活動，除了感謝他們的盛情支持之外，更對他們追求知識的熱情所感動。希望藉由這場活動，讓大家可以有更多學術上的交流。

這場講座的主題：〈朱熹對「夷」的看法及其價值觀的普世意義〉，已經涉及到田浩老師對當代儒學發展的看法，特別著眼在中國大陸這一塊，跟當局、跟共產黨的走向，或是大陸那些標榜當代新儒學的學者對西方普世價值的懷疑，藉此來捍衛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正當性等，這是值得我們關注的、正在發生的一個大課題。田浩教授這些年對這些情況保持敏銳的觀察。田浩教授和哲學系教

授不太一樣的地方是：他不是光談理論，而是藉由《朱子家禮》這樣比較實際的案例去探討中國大陸現階段對普世價值、普世意義或普世精神的看法，這部分其實是值得我們去關心的。

### 田浩教授：

很高興有這個機會，能再一次跟你們討論。今天的題目跟前兩個有很大的不同，我想談普世價值的問題，以及當代大陸學者對普世價值的看法。我覺得可以從很多方面來討論。比方說，幾個月之前，美國同性婚姻合法化了，比較意外的是法官投票決定這件事的時候，美國最高法院的法官之一、Kennedy 法官利用什麼理由認定這些同性戀者可以結婚？他引用理雅各（James Legge）翻譯《禮記》的一句話，做為判斷標準。他說：「孔子教導我們，婚姻乃政治的基礎」，從這個角度來討論，美國的法官有地位、有資格來判斷這件事。當然，假如孔子聽到會覺得很奇怪，為什麼用我的話來支持這個議題？但他卻是在孔子不曾想像過的情況下，以一種普及化的方式運用孔子的概念。儘管如此，Kennedy 普及化孔子概念的做法，與西方世界過去利用中國古代聖人智慧的方式，是相似的。我覺得這個例子的代表性很大，比方說，自由、和平、平等等等，其他國家的人也會利用這些詞彙，但跟歐美國家的人原本的意思會有區別。而且當代歐美國家的人平常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希望亞洲國家能注意到普世價值，所以歐美人一般認為，對普世價值有責任思考的人是在亞洲或其它地方，而不是歐美。

可是假如從歷史上來看，其實情況是相反的。比方說，法國最有權力的路易十五，他很關心歐洲人，特別是法國人對國家沒有信心這件事。他問他的顧問應該怎麼辦？其中一個顧問法蘭索瓦·魁奈（Francois Quesnay）回答說：「陛下，您必須利用中國人熱心公益的精神來教化法國的民眾。」因此那個時候歐洲，特別是法國，就想利用儒家思想來改變歐洲人，讓歐洲人變得更文明。當然這些法國人有自己的立場，要提高法國知識分子對國王的影響，所以把中國的政府模式包括科舉制度搞得更理想化。正如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所言：「在那個時候，儒家的中國似乎包羅了很多正面的價值觀，而當時的歐洲人認為自己正欠缺了這些價值觀。」我認為中國在最近對於西方「普世價值」的反抗，充其量只是歷史發展之中一個階段而已。而且，若中國把「普世價值」轉變成另一種更適合於現代化、以及更為公平的社會的全新模範的話，那麼西方國家在未來亦有可能須要有更深地思考。無論如何，中國與西方國家必定會繼續以有些我們意想不到的方式，來應用對方的文獻與價值觀。

### 文化主義、民族主義與華夷之辯

我想從這個背景開始講，稍微介紹一下列文森（Joseph Levenson）教授的概念，他提出中國傳統概念以文化為主，而不是國家。他將文化主義（Culturalism）跟民族主義（Nationalism）做了區別，19世紀初以來的西方強調國家，而中國古代就強調文化。

民族主義最後在 20 世紀中國掩蓋了傳統的「文化主義」。在我 1979 年的文章中，我不僅把陳亮看作一種「原始型的民族主義」（proto-nationalistic）思想家，而且把他當作 20 世紀中國「民族主義」的先驅。我覺得陳亮的這種思想，比較類似東歐民族主義的概念，他們的相同之處在於老百姓的民族性的血統（*Volk*），所以這種民族主義與西歐的政治概念有不同的根源。在 1979 年的文章中，我強調陳亮有一些很有趣的概念，比方說，他覺得中國的文化、文明，跟中國北部中原地區的「氣」有自然而然的關係，因為有這個氣，中國的文化、中國的特色才能得以發展，所以他擔心南宋放棄了北方中原領土，認為宋朝偏安南方等於把「中國」放在很偏僻的地方，這個地方就是江南地區。而且他認為假如南宋一直偏安南方，就會敗落。女真族則是因為在北方，可以利用中原的氣改變他們的氣，最後可能統一中國，因此他要求南宋快想辦法把女真趕走，強調南宋應該恢復中國北方領土。雖然陳亮討論夷狄之道和中國之道的區別，但是他沒有完全系統化的理論，所以他對朱熹的挑戰有限。我也提到，如果陳亮在與朱熹辯論的時候，曾面對一個表述系統的普世主義者的挑戰的話，那麼其原始型的民族主義的立場，或許會有更大的發展。例如，朱熹注重孟子的「性本善」概念，但是他雖然有孟子哲學的立場，其有關夷狄的論述與孟子並不完全一致。比如，夷狄是否與漢人擁有相同的道德潛能和內在本質？他在談到女真或其他夷狄的時候，也說得不十分清楚。朱熹雖然有文化主義的概念，但是沒有完全地發展出來。作為哲學家他強

調理想性「性本善」的概念，但作為宋朝人他懷疑所謂「小堯舜」的金世宗是否可以改變女真族的性格，所以看起來還不能避免「華夷之辨」的影響。<sup>1</sup>

最近有一篇博士論文，我想稍微介紹一下，因為我覺得非常有趣。楊劭允博士（Yang Shao-yun）寫成了一篇深入地探討中古時期漢人的夷狄觀的論文。其中，對於朱熹的普世主義所作的評論比我更進了一步。楊劭允是新加坡人。2014年，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Berkeley）完成其博士論文之後，他便開始在俄亥俄州的丹尼森（Kenyon）大學任教。很多學者，包括貴校的張其賢教授跟我，都認為傳統性政治制度、社會團結、道德禮儀等「文化」是構成漢人身份、乃至其自身優越感的主要成分。可是楊劭允博士卻強力地反駁列文森這種文化主義的概念。楊劭允亦同時批評了那些著重從文化討論華夷觀的學者，認為我們過份地強調「政治考慮」與外族入侵是構成中國夷狄觀的因素。<sup>2</sup> 反而，楊博士覺得傳統儒家有關的概念僅僅是「民族優越感」（ethnocentrism）。

---

<sup>1</sup> Hoyt Cleveland Tillman, "Proto-Nationalism in Twelfth Century China? The Case of Ch'en Liang,"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39.2 (1979): 403-28.

<sup>2</sup> Shao-yun Yang, "Reinventing the Barbarian: Rhetorical and Philosophical Uses of the Yi-Di in Mid-Imperial China, 600-1300,"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2014, p. 373. 下文所引均出自其博士論文。同時亦見氏著：“*Fan and Han: The Origins and Uses of a Conceptual Dichotomy in Mid-Imperial China, ca. 500-1200*,” in Francesca Fiaschetti and Julia Schneider, eds., *Political Strategies of Identity Building in Non-Han Empires in China* (Wiesbaden: Harrassowitz, 2014), 9-35.

楊劭允認為道學群體開始對儒家的民族優越感表現出一種新的憂慮。他指出這樣的憂慮暗示這些道學家發現，要平衡民族身份與道德的普及化存有一定的困難。楊博士分析他們所面對的問題，乃根源於程頤對《論語·八佾篇》的內容，持有一種律己以嚴的看法。用楊博士自己的話說，就是「自我批判的重新解釋」（self-critical reinterpretation）。孔子說：「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傳統的立場就說：雖然中國沒有皇帝的時候，雖然混亂，可是比夷狄這些外族有文明、有制度的時候，還來得優秀，所以中國永遠勝過夷狄。程頤覺得這傳統會造成有不好的後果，因為很多人會很驕傲地想：因為漢人有文明，比別人都好，所以何必強調修養？當然，程頤的立場是注重修養、克己復禮等等，所以他認為以前的大儒都誤解了《論語·八佾篇》的意思。程頤覺得孔子認為假如中國人沒有皇帝，也沒有文明的話，就不如（比不上）夷狄。儘管那些道學家並不會讓他們是漢族的事實破壞人人都培養個人道德的主張，但道學家所要求的修養與他們所期望宋朝可恢復中國北土地之間，存有一種的抵牾。面對這個困擾的時候，南宋道學家、例如胡寅、呂祖謙與陸九淵、都認為夷狄由於缺乏禮儀與道德責任感，所以夷狄比不上漢人。因此，如果漢人失去禮儀及道德責任感，那麼漢人便會經歷道德夷狄化的過程，並最終做出禽獸般的行為。按照呂祖謙的說法，夷狄化的漢人之心，會引起夷狄之心，夷狄化的漢人之氣，也能感應夷狄的氣。為什麼女真能夠打進中國來，控制北部？就是因為北宋的時候，中國不夠文明，才会有這個

結果。胡宏也有類似的話，中國沒有道的時候，夷狄就來了。道學家普遍傾向於關注夷狄道德惡劣的一面。而在夷狄是否有能力做出合乎道德的行為，以及諸如拓跋氏所建立之北魏等異族政權，是否有能力在中國成為一個合法的朝代，這些問題上，道學家的態度也同樣是不一致和前後矛盾的。

楊劭允博士覺得朱熹的立場沒有呂祖謙、程頤這麼激烈。楊博士認為朱熹通過援引二程所言的三種分類，即人、夷狄和禽獸三者，無視了整個道學群體在「夷狄化」這個議題上所面對的困難。而且，朱熹假定漢屬於人之列。因此，楊氏認為相對當時其他道學家而言，朱熹並不太關注普世主義的複雜性。他覺得朱熹沒這麼關心「夷狄化」的問題，同時也沒有一套完整的說法。舉例而言，一方面有北方漢人說金世宗是一個小的堯或是舜，意思就是他的道德水平到達一定程度，可是朱熹覺得並非如此，他認為金世宗還是有難以改善的夷狄之氣。但他在後來卻因完顏阿骨打（金太祖）在與北宋交涉的時候，表現得十分正直且信守承諾而予以稱讚。扼要的說，楊劭允得出了主要的結論：道學家的「普世主義」影響範圍很有限，且並未得到充分的說明。

但是楊劭允教授攻擊的人不是朱熹，而是列文森。當然，也包括貴校的張其賢教授、還有我。因為他覺得我們太注重用「文化」，來說明華夷之辯。楊博士表明宋代學者對於夷狄的看法是將夷狄視為一種「不道德的、在思想上屬於異端的、以及不合乎禮儀的狀態」，而不是文化的差別。（頁 373）他不了解這三個因素就

是中國古代定義文化的主要標準。所以他的解釋的根本在於：文化主義不是我們當代所了解的文化的意義。但是我覺得他其實誤解了列文森或是我們的用法。我們討論的文化主義，是要形容中國古代的文化，是要討論中國古代人對於文化有什麼樣的概念；而不是套用我們當代的標準或意義。楊博士是非常好的辯論者，他的論點很有趣，也給我們一些可以參考的觀點。我覺得他表現出一種新的潮流，就是懷疑文化實力，包括普世價值，普及主義的立場，與現在中國大陸的潮流有一點接近的地方，所以我要從他轉到當代中國一個特別的情況。

### 〈朱子家訓〉

現在我要介紹一下世界朱氏聯合會。臺灣、大陸、韓國、東南亞都很多人參加這個民間機構，它是個同姓會，只要姓朱，也肯承認你是朱熹的後代，他們就歡迎你加入。聯合會讓我旁觀他們的活動。1993年他們設立這個機構，90年代中期開始強調〈朱子家訓〉，所以我想介紹一下〈朱子家訓〉20年以來的演變和他們的看法。部分朱氏家譜傳下來的〈朱子家訓〉，到了明朝末清朝初有過兩次出版，1996年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朱熹集•外集》之後，開始引起別的人注意。同時朱氏聯合會開始向同姓人介紹並推廣朱家人都應該用祖先家訓的理念。

在2001年，江澤民有「以法治國、以德治國」的口號，而且中共中央頒布的〈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也問世，所以朱氏聯合

會有空間發展。中國共產黨公開地利用過去的傳統文化、包括儒家的文化來服從政治，藉由這樣的發展，世界朱氏聯合會開始更有自信地強調〈朱子家訓〉不但是爲了提高親族的人修養，也是給國家一個目標，讓大家做更好的人。前一年，2000年，聯合國提出千禧年宣言，肯定自由、平等、容忍在當代世界是很重要的概念，北京政府也簽名同意千禧年宣言。這環境也讓朱氏聯合會有了更大的把握推廣自己的理念。北京2008年奧林匹克的口號「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也影響了這個逐漸開放的潮流。秦曉是那時候很有影響力的北京官員，高潮的時候，他在清華大學告訴畢業生，他們應該站在普世價值這邊，實行普世價值。這個環境引起一批知識分子提出08年宣講，要利用普世價值提升中國大陸的政治。這個風尚到了高潮，朱氏聯合會也有反應，那時候永遠名譽會長，韓國的朱昌均，在開會的時候說過一段話，聲明「〈朱子家訓〉並不是只為朱家準備的，同時也是為全世界的人準備的」。這時是2005年，他說得特別清楚，〈朱子家訓〉是給全世界的人的，所以這個修養標準有普世意義。

推廣〈朱子家訓〉的一個主要的高潮是在2010年的馬來西亞。朱氏聯合會到那邊開會，而你們臺灣的朱茂南先生，那時候當會長。馬來西亞朱姓會立了一塊巨大的石碑，〈朱子家訓〉被刻在碑上，並且附帶了英文的翻譯。我特別要介紹朱杰人，朱氏聯合會前任秘書長、朱氏聯合會最主要的公共知識分子。他演講之前，我們一起看中英兩個語言的碑文。他不滿意碑上的英文翻譯，要我重

新翻成英文，而且他說英文必須要是道地的英文，要不然不能影響到全世界的人民。從這件事就可以看出他的立場。演講的時候，他先稱讚馬來西亞的朱氏聯合會刻了碑文，因為大陸沒有〈朱子家訓〉的碑文。

我從朱杰人的演講中，引用了兩個最主要的部份。第一部說：

這是一條非常清晰而可以執行的紅線，越過了這條線，你就不配被稱作「人」了。不僅如此，〈朱子家訓〉還告誡我們如何才能成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高尚的人、一個有修養的人、一個文明的人。它教導我們的寬容、包容、內斂、內秀及嚴於律己、寬以待人的美德，彰顯了中華文化無比寬廣的胸襟和卓爾特立的價值觀。<sup>3</sup>

他強調〈朱子家訓〉可以做為大家的修養標準，這個標準體現了中華文化的精華，所以他覺得這是中國文化最好的表現。第二部他直接地提到了〈朱子家訓〉的普及性或國際性的問題：

長期以來，西方文化不停地宣揚和推行他們所謂的「普世價值」，那就是「民主」、「自由」、「人權」。誠然，這是一種「普世價值」。但是，我們中華民族有沒有可以貢獻給人類的「普世價值」呢？我以為，〈朱子

---

<sup>3</sup> 朱杰人：〈朱子家訓的普世價值——在馬來西亞《朱子家訓》碑刻揭幕禮上的講話〉，《朱子文化》5(2010)，11；再印於朱熹、朱杰人：《朱子家訓》。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頁 15-16。

家訓〉就是具有普世價值的人倫觀、修養觀、道德觀、社會觀和人之為人的基本價值觀。〈朱子家訓〉被公諸於世，短短的二十餘年，迅速的被社會大眾所認同、所接受並傳播到世界各地，被稱作中國人的人生法典，足以證明它的價值是具有普世意義的。（同上注）

在這，他也說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權等等，是一種所謂的普世價值，所以他問中國有沒有可以共享給世界的普世價值。他用這個問題解釋〈朱子家訓〉有什麼樣的好處。因為〈朱子家訓〉可以調整人倫等等，所以他覺得〈朱子家訓〉有普世的意義。雖然他並沒有很清楚地說到這是普世價值，可是有提到普世意義，而且他花了很大的工夫，不但委託我翻成英文，還有至少十個語言的譯本。從這個角度來看，我覺得他很清楚地要推崇〈朱子家訓〉當作普世價值。但他也非常聰明，他是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的社長，現在已經榮退，所以他很清楚紅線在哪，紅線指的是可以怎麼說與可以出版什麼話的區別。因此，我覺得那時候，雖然有普及主義的潮流，但他好像已經感覺到有點危機。

### 仇視普世價值的高潮（2012 年末到 2015 年中）與〈朱子家訓〉

從 2012 年秋天開始習近平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導以後，北京政府對普世價值的態度有大的改變，開始仇視普世價值。在 2012 年 11 月 21 日政治局新成員劉奇葆接管宣傳部以後，這個轉變尤為明顯。「七不講」的通告下發到各高校，華東政法大學的張

雪忠老師把通告內容轉發給媒體，他因洩露機密而遭辭退。某些新聞媒體和網站，尤其是香港的《大紀元》，在 2013 年 5 月中旬公佈了一系列的議題。劉奇葆的通告說高校有七件事情不可以講，或是七個題目在大學不能討論。第一個就是普世價值，但也包括：公民社會、公民權利、共產黨的歷史錯誤、權貴資產階級、及司法獨立等。大陸有些朋友不肯承認有「七不講」的通告，可是另外一些在大陸的大學學者承認他們大學討論過這個通告。很多朋友說這通告沒有這麼嚴重，只很臨時的通告，但我還覺得這是很重要的事。劉奇葆的公開言論避開「七不講」，但他刊載於《求真》的著名文章讚揚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模式，而且批評有人鼓吹學習西方發展模式。<sup>4</sup> 與劉奇葆的文章相比，習近平的言論更大力、更確切地肯定了儒家精神。<sup>5</sup> 這些政府官員制定了一套政治文化，讓基層的儒家學者在該文化下工作。在那個背景下，朱杰人與一群來自北京和上海的年輕哲學教授，討論「普世價值」的問題。

這些年輕的哲學家在復旦大學舉辦了一個會議，集合起來討論

---

<sup>4</sup> 劉奇葆：〈我們走在正確的道路上——關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幾點認識〉，《求是》（2014 年 10 月）；再刊為〈道路好不好走在這條路上的人最有發言權〉<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1015/c1001-25836646.html>。

<sup>5</sup> 例習近平：〈習近平在紀念孔子誕辰 2565 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暨國際儒學聯合會第五屆會員大會開幕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參 CCTV 的報告：[my.tv.sohu.com/20140924/n404622727.shtml](http://my.tv.sohu.com/20140924/n404622727.shtml)。

普世價值，他們的討論修改後編成《何謂普世？誰之價值？》<sup>6</sup>這本書，其中曾亦、郭曉東兩位當編輯。他們的討論引出了政府一邊提倡中國式社會主義、一邊譴責普世價值的學術依據。這些哲學家認為所謂普世價值，只有歐美歷史和文化演變的淵源，而且歐美資本主義者要利用這種西方意識形態的工具，來領導和征服世界，且要壓迫中國，讓中國混亂。同時這些年輕的哲學家也批評臺灣、香港的「新儒家」，覺得臺灣、香港的新儒家是投降派，投降給西方，跟西方討論普世價值，而不能替中國文化說話。所以這些年輕的哲學家拒絕稱呼自己是新儒家，而稱自己為「當代儒家」。書的作者認為中國應先掌握好儒家文本和思想，在建立一套自己的系統和學說後，再與西方進行對話。

書中對普世價值和西方心態的理解，好像主要是來自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亨廷頓寫了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這本書，2002 年也有中文版出版，《文明之間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他在美國算是極端右派的知識份子，他的立場不僅反對普世價值，更反對所有普及主義的概念，他非常嚴厲地斥責多元文化的傳統，他覺得美國主流傳統就是假的，是欺騙美國民眾的。他反對亞洲等外文化的移民來美國，也只要所有美國人用美國的英語，而且要抵抗外來的文化。他還批評美國人忘記了普世價值只是美國人

---

<sup>6</sup> 曾亦、郭曉東主編：《何謂普世？誰之價值？》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 年，再版 2014 年。

歷史文化的價值觀等等。大陸的年輕哲學家們利用他的概念，將他的概念當作美國的政策，也當作美國的主流概念，而不管美國的其他立場，也不管美國多數知識分子其實會覺得亨廷頓太極端，並不認同他的看法。這些年輕的哲學家就集中在亨廷頓的說法上，因為他的話比較適合他們的政治立場。可是他們不但把西方普世價值的地位降低到只有一個國家、一個文化的地步，同時因為儒家思想是中國產生的文化，所以只跟中國有直接聯繫的，才對中國有價值。再進一步，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也是中國演變出來的，所以它很有價值的原因，只是因為跟中國有密切的關係。我覺得這樣的說法跟傳統的馬克思主義，包括毛主席的立場有很大的矛盾。例如，毛澤東希望他的革命影響到全世界，希望幫助所有人解放。在 20 世紀有很多人為了實行共產主義而死掉，而他們不單為了中國。而是覺得馬克思主義是最有科學性的概念，能告訴我們歷史的潮流為什麼發展。共產黨的概念跟這些哲學家的立場，我覺得已經比「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概念走得更遠了。大陸主流的概念，以及中國的社會主義概念，使得這些腦子很靈活的哲學家，將這個概念推論到邏輯最極端的結論。

《何謂普世？誰之價值？》這本書的年輕當代儒家有時譏笑共產黨，而且攻擊普世價值，他們強調所有的價值在特定的地方和時代都會發展而進化，故而所有的價值都受制於特定的文化與歷史。所以他們否定儒學，也否定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有普世意義。雖然有人可能會說，復旦當代儒家只把「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口

號伸延到其邏輯性的結論，但事實上他們挑戰了中國共產黨政治文化的基本假設。為什麼還可以出版？我去查了是哪個出版社出版的？結果就是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而且朱杰人還寫書評稱讚這本書。書評中的一些話很有意思，比方說：

這可能是[中國人]第一次有膽識、有信心去發表儒家與價值觀的看法，並將之與西方與價值觀的看法並列，更毫不猶豫地宣告儒家價值是優越的、是有歷史理據的。由此可見，他們已展示出對中國文化的自覺和信心。<sup>7</sup>

朱杰人稱讚這本書中年輕當代儒家的大膽、信心，他以為這些年輕人都是從國外拿到博士，然後回到中國，因此他們非常英雄，甚至於能夠批評他們的國外老師。可是其中有一個人，復旦大學的白彤東教授，他是波士頓大學的博士，我跟他討論的時候他說，在復旦年輕哲學家集會討論的時候，他自己多次提起過不同的立場、不同的意思，但是每次這些哲學家都說，白教授只在開玩笑，就帶過去了，完全不考慮他的意見。同時白教授告訴我，他是這個年輕哲學家圈子裡的唯一一個有美國或外國的博士學位的人，其他都是中國國內的博士。這當然是一件小事情，可是我覺得這可能影響到朱杰人誤解地以這些年輕哲學家為膽子大的英雄人物。反而，事實上因

---

<sup>7</sup> 朱杰人：〈理直氣壯的文化自覺——讀《何謂普世？誰之價值？》〉，《中華讀書報》（2013年3月）；當作序言收入曾亦、郭曉東主編：《何謂普世？誰之價值？》。

為他們不是外國的博士，他們有更多自由隨便批評外國的學者。後來朱杰人的書評變成書再版時的前言，而且再版之前，朱杰人先跟一批年齡較大的哲學家開會討論這件事，然後再跟年輕的教授討論，希望找到合作的空間。我看他的書評時有點奇怪，因為這與朱杰人自己強調〈朱子家訓〉的普世意義有衝突。後來有機會跟他討論這件事的時候，他承認那年輕人的立場跟他有些區別。比方說他們不太在乎宋明理學或道學，他們要回到孔孟先秦的儒家思想，而朱杰人當然強調朱熹文化。後來他說要回復儒家文化，必須合作，不一定需要概念一致。

朱杰人寫了一篇文章，〈〈朱子家訓〉的普世意義〉，後來他編了一本《朱子家訓》將這篇文章放在裡面，也是由華東師大出版。在這篇文章中更清楚地強調他的立場，更清楚地利用亨廷頓的書。可是在我看來，很多中國朋友們不太清楚亨廷頓的背景，因為亨廷頓排斥外來的文化、外來的人包括中國人。他的立場注重歐美國文明跟亞洲文明有很激烈的衝突，彼此容易打仗。亨廷頓激烈地反對多元文化主義，也激烈地反對普世價值，認為這兩個歐美傳統對歐美自身很危險，但是多半美國知識分子覺得他的思想太極端、太危險。亨廷頓覺得美國的道德，美國的思想、理想等等都快衰亡了，現在幾乎沒有什麼價值，因為已經包容了這麼多黑人、亞洲人，已經把純粹的文化都破壞掉了。亨廷頓將美國的「普世性」形容為「虛偽」、「雙重標準」、「虛假」、「不道德」和「危險」，與美國「多元文化主義」下的開放式文化恰恰相反。可是看

起來大陸某些朋友不太清楚他的意思，所以將他對多元文化主義的批評當作客觀的分析，因為他們可以拿亨廷頓的話當作一種方便的武器。朱杰人也還不肯完全放棄他對普世的概念，或是普世意義的立場。但他很小心地運用「普世」，因為在現在大陸主流的政治立場中，「普世價值」就等於歐美的價值而已，所以他利用「普世意義」的口號，而且希望西方人用中國的儒家思想，尤其是〈朱子家訓〉，當作參考意見。例如，他說：

我在這裡提出的不是「普世價值」；而是「普世意義」。之所以如此表述，是想說明，我並不想把中國人的價值觀強加給任何人，我只想說明，這種價值觀具有普世意義，它也許可以成為西方普世價值論者一點有益的啟示。<sup>8</sup>

朱杰人這麼贊成復旦會議裡青年哲學家的那本書，其中一個原因大概是，他覺得美國人很討厭，不肯考慮中國的普世價值。恐怕這個問題跟我一個不成功的努力有點關係：我們學校的柏夷教授（Bokenkamp）幾年前，被著名課本出版社 Norton 邀請，編一套有關中國宗教的教材。有一天我向他提到〈朱子家訓〉，柏夷認為很有意思，所以決定將〈朱子家訓〉列入這本教材中。我將這件事告訴朱杰人，朱杰人很高興，可是很可惜柏夷跟出版社發生了矛盾，後來教材編寫換成哈佛大學的教授，但新的編輯不要儒家思想

---

<sup>8</sup> 參朱熹、朱杰人：《朱子家訓》，頁 24。

的部分，只要道教的。可能這個結果也影響到朱杰人，讓他對美國感到失望。

## 結論

最後的結論我簡要地說明，我覺得朱杰人跟〈朱子家訓〉在大陸的演變，也受到政治鬥爭、政治情況的影響。在江澤民「以德治國」的政策之下，政府留出空間讓人討論〈朱子家訓〉對國家建設的好處以及其普世意義，所以朱氏聯合會也利用了這個機會。反而，習近平執政之後，政治潮流改變了，並有「七不講」的通告，所以宣揚普世價值變得十分困難，所以這也影響到了朱杰人強調〈朱子家訓〉的空間。在這個新的環境裡，《何謂普世？誰的價值？》這本書是個特別好的檔案，讓我們進一步了解潮流的演變。同時，這些年輕哲學家的圈子跟朱杰人本身發展特色的聯繫與合作，讓朱杰人以爲他們是膽子大的英雄。但是，我認爲那些年輕哲學家的膽子還不夠大。

假如從歷史的角度來看，並稍微做一個比較，隋朝的智顛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智顛面對更嚴重的普世挑戰。那時候，中國的儒家思想和道教已經衰落，而且外來的民族控制中原已經兩百五十多年，外來的佛教在國內外的影響最深遠。連漢族的佛教高級和尚也不太清楚佛教很多方面的內容，從印度進來的佛經互相有矛盾，佛教也分成了很多學派。所以天下、文化、社會等等也比較混亂。現代中國從鴉片戰爭以後，開始了一百年的屈辱歷史，當然是很嚴重

的國內外的危機時代，但是不一定比西晉末到隋朝初更嚴重。智顛在危機時代，算是特別重要的佛教知識份子，他想將所有佛經、和尚之間的衝突解決。怎麼解決？他說釋迦牟尼佛叫他到天堂來，教他怎麼念所有的佛經，其他人認為這些佛經有很多矛盾，可是佛自己告訴他，你可以看出文字之間的空間，闡釋未完全說出來的含義。因此他可以挖掘出更深的意義。按照這更深刻而高遠的意思來看，所有的佛經都正確的，都是有道理的，但有的層次更高，有的比較簡單而已。假如很有耐心，可以從最低的程度開始，一輩子、一輩子慢慢往上面走而理解。但假如想要比較快了解所有的佛經，那麼服從智顛的系統，就可以有全面的了解。智顛還將靜坐不同的傳統系統化，讓靜坐也可以比較快得到結果。而且還把佛經的道理跟中國文化融合起來。我覺得他這樣做，事實上與他當時的政治情況等因素有關係。當隋朝統一中國的時候，智顛的文化信心隨之增加，讓他有把握面對文化危機，並且直接地了解佛經，將不同佛教的傳統矛盾解決，將佛教的情況跟中國結合起來，呈現出一個新方向。另外，佛教本來就是普及主義的宗教，通過智顛的整理之後，更具有普世意義。智顛真可以當作有中國特色普世價值的英雄。

從智顛的比喻來看，其實在復旦會議上年輕的當代儒家們應該更有文化自信，膽子更大地跟歐美的普世價值互相討論。而且不必找美國很極端的知識份子來，依靠他對美國主流多元文化和普世價值的批評；還將那個極端思想家的言論當作美國的主流思想，拿這種所謂美國的傳統來把美國變成一個敵人。我覺得假如真的有文化

的自信，不必太怕討論普世價值。在我看來普世價值不單是給中國這類東方國家的一個挑戰，也是繼續給歐美國家的挑戰，因為還沒有一個國家能完全實行普世價值。美國有很多方面做得不好，而且美國應該更坦白地承認：普世價值一定會受到不同國家傳統、不同文化的影響，而有改變。從智顛的例子可以看到類似的情況，他改變了當時最普世性的宗教，之後不但影響了中國後來的佛教，而且也影響了韓國、日本以及歐美的佛教。

我們已經可以看出中國有一些重要的改動，例如中國基督教、天主教 50 年來經歷了一些大的改變。我覺得，一方面西方應該了解中國會有一些根本的改進，將普世價值、民主等概念與中國的情況調和，另一方面希望大陸學者可以更有把握地跟我們對話。今天我又講太多了，很想聽劉祥光教授和大家的意見。

### **主持人車行健教授：**

謝謝田浩教授精彩的演講，接下來我們就把時間交給劉祥光教授。

### **與談人劉祥光教授：**

謝謝田浩教授，謝謝車教授邀請我來。我要怎麼講呢？我不是宋史專家，我到現在還在學習宋史，每當聽到人家說我是專家的時候就覺得全身不對勁。剛才車教授說與談人不一定要設立，如果說不是一定需要的話，我一分鐘就能結束，如果說要有的話，我就借

題發揮一下。非常謝謝有這個機會讓我反省一下自己過去所學。這樣說大概有點攀附關係。我很早就認識田教授，雖然他不認識我，但我認識他，以前我在紐約讀書的時候，曾在波士頓、華盛頓、芝加哥參加過亞洲學會年會（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見過田浩教授。當然也讀了老師的書，有一本書，大概 2000 年以前翻譯的，《朱熹的思想世界》，由臺灣的允晨出版社發行，還有就是十年前在大陸出版的《宋代思想史論》，那本書的某些論文我也把它當作教材，所以在精神上對田浩教授不那麼陌生。

我收到車教授請中文系轉給我這篇文章，主題是 *Zhu Xi's View of Barbarians and the Issue of the Universality of his Values*，中文就是〈朱熹對「夷」的看法及其價值的普世意義〉，剛剛我想各位都很清楚聽到田浩教授所言，這篇文章的重點就是田浩教授剛才的報告，非常有趣。對我來說，我想這是歷史學家對一個現在進行式提出看法，就是中國大陸政權在世界舞臺崛起過程中的心態很有趣，一方面他要從世界列強之中站出來，告訴他們我們不可欺負，就像毛澤東奪得政權後，在天安門上說「中國人站起來」，我想他們那種感覺到現在依然還在。怎麼站起來呢？非常有趣。這篇文章取一個角度，講到朱子學裡面的《朱子家禮》，並以其推廣過程作為一個切入點來看在中國大陸的情形。如果要推廣的話，它具備普世價值是很重要的一個角度。但是很不幸的，普世價值的概念又跟共產黨政權的意識形態衝突。所謂衝突是指，他們在國際舞臺要站起來，要握有主導權的過程，他們的衝突表面上看起來很小，但是

其實並不小。對我個人來講，感覺就是看完這篇文章後，在結論部份看到這個人。如果在座的同學沒有讀過的話，我建議找電子檔讀一讀。最好文章能翻譯成中文，閱看率會更高，這是我讀了以後的感想。

我要強調一點，儒學在過去是和正統、政權綁在一起，特別是政權綁在一起。所以中國過去會有儒家主導的社會或傳統社會是儒家主導的說法，就是因為跟政權綁在一起的結果。很明顯的是：1905年科舉廢掉後，儒家就不再有政權在後面支撐，所以儒家在中國政治社會舞臺上越來越弱勢，是跟這個傳統有關。民國以後，特別是五四時期，雖然還有影響力，但是在政治社會上的影響力是越來越弱。很有趣的是上個時期，80年代中後期，特別是90年代，我們看到儒家又受到共產黨、大陸當局的青睞，有逐漸復興的趨勢。歷史是弔詭的，儒家又是靠著政權復興起來。我對儒家沒有特別的好惡，我個人認為儒家、新儒學、或是宋明理學有其偉大的傳統，如果他們不靠政權支持，他們的發展會不一樣，當然這是歷史上的如果，誰也沒辦法說。我看到了這個有趣的發展，世界朱氏聯合會每期都送通訊，各位如果能看出它們之間的關係，我相信會是很有趣的觀察。

我要說的第一個，就是他們的發展和政權相關，可是政權的走向又回頭影響他們的發展，很有趣的現象。如果要我進一步說，剛才田浩教授所談的，現在普世價值在某些時候，跟他們的民族主義是會發生衝突的，尤其是在中國大陸。這引起我的想法，就是說當

民族主義越是蓬勃發展的時候，特別是在政治上跟政權綁在一起發展的時候，很容易有排外的傾向，這個在中國近代史上看到很多，甚至不用說，到今天海峽兩岸的情形就是如此。我們可以看到，一方面強調中國特色，臺灣方面就是我愛臺灣。你總覺得幹嘛要講這種事情，就像你會跑到外面去說我愛我家嗎？你會跑到外面說我愛我爸媽嗎？當一個社會這樣強調的時候，這個社會是有問題的，當強調我愛臺灣，還是中國特色時，表示這個地方有問題，而且有不小的問題。從這點上來講，既然不要輸入，那東西也出不去，我想這點是值得所有人放在心裡的，學問要出去，也要進來，也就是需要交流。

這篇文章最後田浩教授舉自己的例子非常好，你要寬廣才能成其大。中國歷史上沒有一個朝代是封鎖不交流的，程度而已。譬如我講一下宋代，一般認為宋代比起唐代是相當閉鎖的。不對，舉個例子，蒙古人崛起的過程裡，打遍世界各地，就只有中國頂了五年，沒有其他政權頂得了那麼久，這就是個例子。這是靠宋代容納各種科技跟蒙古人對抗的成果。宋代也輸入各式各樣的器物，對外文化抱持相對開放態度，元代更不用說，明、清也都各有開放的一面，只有開放才能讓你更強大，我想這篇文章讓我們看到這些。一方面我覺得很有意思就是指出來共產政權犯的一些有趣的錯誤，另外一方面從臺灣的角度來看，我的看法就是告訴我們要寬闊一點。

## 主持人車行健教授：

謝謝劉主任非常精采的回應。田浩教授今天這場演講，對我們學中國思想史的人來說可說具有雙重意義。第一個意義就是讓我們回到傳統思想史的論證、脈絡中，譬如最後舉智顛的例子，強調開放性、強調包容，以及田浩教授文章中指出文化自信心的問題。跟智顛做對比，我想最好的例子大概就是韓愈，韓愈就是把門關起來，尤其只強調儒家傳統的優越性，我不曉得他心中有沒有普世價值的概念，如果有的話他可能覺得儒家聖王之道才是普世價值。我們所學的不論是勞思光、牟宗三，或是中國哲學史、思想史的教科書，大概都不會用現在談普世價值的觀念去跟既有的思想史、哲學史論述結合起來去談，但其實是可以的。聽過田浩教授的展示，雖然他的重點不完全在朱熹，或是古代思想史，可是我覺得聽完之後再去重讀古代思想史的時候，可以有這樣的啟發和視野。

第二個就是田浩教授的演講更關注的是中國大陸當代的文化 and 思潮走向，不可避免這跟當前的局勢、跟共產黨的控制有很密切的關係，所以才會有像朱杰人這樣的學者，或是剛才所舉的年輕哲學家對普世價值的種種辯論、思考。我在想他們也不是反對普世價值，只是他們認為中國有中國自己的普世價值，中國也可以貢獻給世界的普世價值，如果用他們的話來講，他們是不是要建立有中國特色的普世價值？不過這句話有矛盾，如果有中國特色的話，又如何稱作普世價值？我覺得都蠻有意思，都是值得關注、值得思考的

議題。而且對未來不管是政治局勢或文化思潮、學術討論，都是可能會產生深遠影響的議題。雖然我們都是學文史專業，可是我想這與我們當下有關，是我們應該要去關注的。底下請各位學者專家或同學提問，有什麼問題想要跟田浩教授或劉祥光教授切磋的？

### 提問 政大政治系張其賢教授：

我就先造次提兩個問題和一個想法。第一個先說我覺得田老師舉智顛很有意思，不過我倒覺得孔子可能是智顛的先驅，因為《論語》裡面顏淵問他說為政之道，結果孔子沒有回答他如何治理國家，而是要用夏代的曆法，夏之時，用商代的車子，然後用周的冕，夏、商、周我想在孔子那時候可能還沒有建立成一個華夏系譜，可是他能用不同文化裡面最可貴的東西來治理國家。所以我想其實曾亦先生是當代儒家的話，可以思考一下孔子治理國家其實是用不同文化最精華的貢獻，這是一個，當然曾亦先生不在這邊，只是一個想法。

另外，我覺得剛剛車老師提的問題非常有意思，世上有沒有一種有文化特色的普世價值？因為我之前曾經讀過一篇文章 Isaiah Berlin，他在 1970 年代寫了一篇很重要的論文是 Nationalism，他把西方 Nationalism 的起源追溯到 Giambattista Vico 和 Herder，他稱之為是利世主義，後來發展成浪漫主義。利世主義的特點就是沒有普世價值，所有價值都屬於他特殊的文化生命，Vico 的概念主要是針對法國啟蒙派認為有普世價值，所以看起來這兩派是針鋒相

對。可是我倒是覺得，普世價值沒有所謂無根的普世價值，這可能就是普世價值最大的問題，因為人的價值認同需要歷史文化的根基，所以我認為這兩者未必是衝突的。從歷史文化的根基裡會產生一些價值，那是特殊歷史文化的產物，但是又具有普世意義，如果從這點來看的話，我們應該思考的是從每個特殊文化產生的價值如何產生普世意義，這種有文化特色的普世價值或許是可以考量的方向，只是一點想法。

### **主持人車行健老師：**

還有沒有其他人有一些想法？在座是不是有一些中國大陸來的同學或學者？我想也可以就你們的觀點或感受來回應田浩教授所講的議題？

### **提問 臺大中文系史甄陶教授：**

田浩教授你好，好久不見，今天非常榮幸能夠聽到你這麼精闢的演講。但是我想您在強調普世價值的問題之前，可不可以請您再多說明一點為什麼一定要建立普世價值這個問題？當然這個問題是個非常愚笨的問題，但是我個人其實是進一步在想，如同剛才張老師有提到，想建立有文化特色的普世價值，可是又面對普世價值這個概念。其實每一個價值都有自身保存的文化和背景，這情況下會讓我思索到：這些普世價值的合理性是什麼？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我剛才受到劉祥光教授回應的啟發，又想到的

一個問題：我們如何避免讓普世價值成為建立帝國意識形態合理性的一個工具？因為中國大陸現在採取提倡儒家的政策，其實背後也蘊藏興起另一個要成為世界霸權的合理性的可能，所以它想從文化內部找出文化特色來，不知道老師對於這樣的問題有沒有什麼看法？謝謝老師。

### **主持人車行健教授：**

史甄陶的問題就是對應剛才田浩老師所講的內容，我突然想到有一個點蠻有趣的，就是田浩老師演講中提到：中國大陸那些當代新儒家，對港臺新儒家有所批評，他覺得是我們太軟弱了，全部都是聽從西方的等等。可是我覺得也蠻奇怪的，因為在很長一段時間，港臺新儒家一直被認為是文化保守主義的代表，相對於像胡適那些自由主義者而言，港臺新儒家是很保守的。對於大陸興起的這些當代新儒家來講，又覺得港臺新儒家太往西方靠近，這也是蠻有趣的現象。不曉得田浩老師有沒有觀察到這個現象，我想你的老師余英時先生，以及余英時先生的老師錢穆先生應該也都置身在這樣的困擾當中，對於夾在新舊價值衝突當中所處的地位跟角色感到矛盾跟掙扎。

### **田浩教授：**

很高興你們提了很多意見和問題，讓我參考。特別感謝劉先生，我記得我們在美國曾經見面，但沒有很多機會來往，所以沒有

很深刻的印象，很高興有這個機會多一些了解他。劉先生提到政權的問題，我承認這是一個很大的因素，而且當代情況在大陸特別有趣，可是這當然很難避免。我選世界朱氏聯合會研究的一個原因，就是他們不是特別注重孔子。和孔子相關的學會，平常跟政府關係特別密切，有孔子學院等等，不必多加解釋。朱氏聯合會開始的時候，曾受到政府的懷疑與壓力，90年代末，有兩次朱杰人遇到麻煩，政府官員來，問他很多問題。而且一開始，這個機構完全沒有合法的地位，這也可表現世界朱氏聯合會是民間的機構。但是他們機構還是抓住這個機會要跟政府拉關係，所以政治問題不能避免，也增加了討論的層次。

排外的趨向當然也很難避免，劉先生大概從《朱熹的思維世界》那本書認出來，我對朱熹有些批評。其中我覺得最困擾的就是排外傾向的發展，這和為什麼要討論普世價值有什麼關係？無論有沒有普世價值，我希望我們認識別的國家的文化之後，要研究、學習、利用對方好的方面，所以我從法國的例子開始講。那個時代法國知識分子特別強調法國人需要中國的精神、尤其是儒家思想，來改變歐洲人的文化水平。可是我個人發現，我們當代人常常學習對方壞的方面，而不是學習對方好的方面。所以我覺得即便沒有普世價值這個詞或這個概念的話，我們還是會做一些類似的討論。從西方的立場來說，普世價值表現這個文化最好的目標。而我覺得要了解一個國家，或是一個文化在某方面覺得特別難實行的一套標準、最大的挑戰是什麼，就要看這個文化、或是這個國家提出來的目

標、標準。比方說，基督教強調愛別人要像愛自己一樣，但為什麼強調這個？就是因為這是給歐美人最難的挑戰，所以一定要注意、一定要討論這個口號。我覺得往往外來的人聽到美國要討論民權、自由、等等，都會誤解美國覺得在這方面超過別人。我承認有些美國人有這樣所謂「美國本質」的概念。可是我覺得美國真正的知識分子會了解，我們為什麼要提倡這樣理想的價值觀？那是為了提醒我們有很多方面還沒有做到，所以要特別地注意。

對類似儒家的例子，比方說〈朱子家訓〉，有兩種不相同的說法。第一，有朱高正的說法，我聽他講〈朱子家訓〉的時候，他的立場就是：你看，咱們中國人的美德這麼好，比別的人更好。可是在我看來，可以用不同的角度來看待朱熹為什麼寫〈朱子家訓〉給他家裡的人：朱熹知道他個人有些缺點，尤其他很容易生氣、發脾氣，所以〈朱子家訓〉提醒人要避免這個缺點，必須對別人要寬容，對自己應該比較嚴格。這是因為他自己常常是做不到的，他大概想他的後人也會有這個毛病。我特別相信我老朋友朱杰人真的是朱熹的後代，因為他也很難控制他的脾氣。朱杰人知道朱熹寫信給呂祖謙的時候，承認自己脾氣太厲害，而且朱杰人比較同意我這第二種說法。因此，我覺得應該討論普世價值這個問題，從這個角度想，我們大家在哪些方面缺乏？我們跟所認為最好的目標，隔了這麼大一段，所以希望彼此可以互相學習、修養，這樣的態度我認為，可以讓意識形態的攻擊減少很多。當然很容易有媒體或政治家，抱著朱高正那樣的立場：說這邊什麼都好，那邊都差得多，應

該學習這邊的美德，當然也有美國人持有這樣的態度。可是我不願意讓那樣的人抓住〈朱子家訓〉中的觀念，支持他們排外的想法。同時我也批評所謂「美國本質主義」者將普世價值當作他們帽子上的名號，且當作他們所左右的標準。我不願意自由、平等等等，被他們奪走。這些價值太寶貴，是大家都需要考慮的。我想普世價值比較適合符合我這類的立場，而且這個立場跟儒家主流傳統方向比較契合。例如，我們應該做什麼？就是要做更好的人，有更好的道德修養。

當然每一個普世價值都有歷史背景和來源，它是從一個國家或是一個文化演變而來的一套理想的標準。這個歷史文化觀與普世概念之間，一定含有張力甚至於矛盾，可是從歷史學的角度來看，這樣的關係也有其好處。比方說，我有一個日本老朋友，一位佛教禪宗的和尚。他跟我提了一個概念，我覺得有道理：以前在日本，有佛家的傳統、也有儒家的影響，儒家的影響跟佛教的影響有相同、也有相對之處，他認為儒家的傳統幫助很多日本人調整本地佛教的趨向。到了 20 世紀，儒家影響變得太衰弱，所以日本人很容易主張本地佛教的特色和本質，且強調武士、義士的概念，從而變成了國家要更強大，要告訴亞洲其他人民，應該跟著日本的方向走，產生了霸道的觀念和行為。他認為以前受到儒生的影響，這樣的發展比較難以發生，儒生的概念會稍微控制這些想法，會稍微做文化的調整。所以文化跟文化之間的張力關係，也可以有好處，畢竟如果只是單方向發展，很容易走到極端。今天，我又講了太多了，但很

感謝你們的耐心，也很感謝你們提出這麼多的好問題，提供好的意見，我將來會繼續思考，希望我能進一步研究這個問題。

### **主持人車行健教授：**

謝謝，田浩教授最後的話，我覺得是蠻語重心長的建議、忠告，也是我們對人類文明一些基本期許以及努力的方向。有些價值是值得捍衛或丟棄的，不是因為時代，或是因為國家地域、政黨特殊性的要求就調整或改變，所以我也確信，明年美國的總統大選田浩教授是不會投共和黨的。2015 年王夢鷗學術講座到此完滿結束，我們再次感謝田浩教授這一個禮拜非常辛勤、付出很多勞力和智慧，帶來這麼好的學術啟發。